

参差对照的“华语语系文学”

——越界的地理或文学？想象的政治或诗学？^①

邓 良

“华语语系”（sinophone）研究在 21 世纪的最近 15 年来跃升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论域，其间史书美与王德威二人发声不辍，成为该领域的两杆风旗。在大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多将 sinophone/华语语系的提出首推到史书美，以致以讹传讹^②。其实，目前能看到的关于 sinophone 一词英、汉双语的最早记录，乃马来西亚学者陈鹏翔 1993 年杜撰，并译之为“华语风”^③，但在当时并没引起学术关注。10 年后的 2004 年初，史书美在其一篇英文论文中使用“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语来区别惯常所说的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新诗集‘序跋’研究（1918-1949）”（21YJA751006）的研究成果。

② 例如，汤拥华写道：“2004 年，史书美在一篇题为‘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的英语论文中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见汤拥华：《文学如何“在地”？——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与实践》，《扬子江评论》2014 年第 2 期。刘俊说：“最早在英文论文中使用‘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华人学者是史书美（Shu-meí Shih）。”见刘俊：《“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文艺研究》2015 年第 11 期。张重岗说：“‘华语语系’概念的提出，始于史书美。”见张重岗：《“华语语系文学”的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 年第 4 期。王璇说：“‘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由美国学者史书美提出。”见王璇：《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辨析》，《中国比较文学》2020 年第 1 期。孙碧卿说：“在北美汉学界，亦有学者……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术语‘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书美教授（Shu-meí Shih）首先提出并定义这一概念。”见孙碧卿：《作为问题的“华语”——〈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华语语系文学”视野》，《小说评论》2022 年第 3 期。

③ 陈慧桦：《世界华文文学：实体还是迷思》，（台湾）《文讯》1993 年第 52 期。陈慧桦系陈鹏翔笔名。关于当初首创该词的详情，可参考翁弦尉、陈鹏翔：《杜撰“Sinophone”的第一人：陈鹏翔教授回想“华语风”》，（马来西亚）《蕉风》2014 年第 507 期。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①。史书美在文中并未解释这一概念，仅作了一个较长的注释。从这个注释中，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她当时用 *sinophone literature* 至少想要表达三层意思：其一，中国大陆的文学被排除在外；其二，抗拒现行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选择性收编，一些地方中文被视作殖民语言；其三，汉语书面语的通用化是前现代的历史，今天要注重的是口头形式。这三层意思在其接下来十多年的论述中得到了更为明确、集中的呈现，其具体表述的洞见、偏见与不见，将在后文与王德威观点的对照中展开。

史书美使用 *sinophone* 时并没有翻译为中文，将之对应为“华语语系”使之广为流播，则要归功于该术语和理论的另一位推行者王德威。2006年，王德威在大陆发表的《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一文的开头直言：“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新兴观念。”^② 自此之后，“华语语系”成为 *sinophone* 的通译^③，并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从此文中，我们也可读到王德威之“华语语系文学”的三层意思：其一，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不言自明地有着与国家想象、正宗书写崇拜及历史宏大叙述相关的隐喻；其二，“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提出与20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互为呼应；其三，在全球化与后殖民等理论的激荡下，“文学”的观念不得不加以重新定义。

显然，王德威与史书美的论点与视域在表面上看来有着高度的集中和重叠，但在接下来十多年的各自论述中，真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景观。不仅二人之间的观念有着互为参差的对照，他们各自前后的表述也形成互为参差的对照。

①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Vol. 119. (1) 2004, p. 10.

②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③ 这里并非说王德威乃“*sinophone*/华语语系”对应翻译第一人。2017年，史书美在其专著《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9页）的一个“注释”中指出，将 *sinophone* 翻译为“华语语系”是她“提供给译者”纪大伟的。经查阅，史书美2004年发表于PMLA的英文论文“*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的中文译文2004年同时发表于台湾《清华学报》，在中文版的“注释5”，翻译者纪大伟确实译的是“华语语系文学”：“我将‘华语语系文学’和中国文学区分开来。我所指的中国文学，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华语语系文学，则来自中国本土之外，在世界各地以华文写作的华语作家。”详见史书美：《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纪大伟译，（台湾）《清华学报》2004年第1期。十几年后，史书美说如此翻译是她提供给译者的。遗憾的是，笔者未能与纪大伟取得联系以确证此事。

参差的对照 1：反离散与后遗症

2007年，史书美的英文专著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① 首次集中阐述其“华语语系”观念。这也是全球学界首部涉及华语语系的专著，其中译本于2013年在台湾出版。该书将时间与空间锚定回归前的香港、当代台湾与当代美国，聚焦电影导演李安、陈果、张坚庭和装置艺术家刘虹、吴玛俐以及台湾的电视节目，通过分析这些文本的视觉性，探讨视觉与认同如何表述、如何呈现，这正是二者与华语语系间的关联。

在前文中我们简要梳理过 sinophone 概念的生成，无论史书美还是王德威，谈论华语语系的一个共同前提是对传统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不满、对传统华文文学研究“离散”模式的质疑。史书美倡导华语语系研究 (sinophone studies)，挑战以往的离散中国人/离散华人 (Chinese diaspora) 研究。她认为“离散中国人”指的主要还是汉族的离散，隐含着汉族中心主义，简化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多语言的事实，“中国人”、“中国性”等名词成为“对于词汇的操纵”。大一统的离散中国人概念，一方面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海外华侨”修辞相关，认为所有侨民都想落叶归根，重返中国原乡；另一方面，又声援西方国家利用种族化的中国性来作为永恒异国人的说辞。事实上，“在横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当地讲各种华语的人 (the sinophone peoples) 早就已经在地化，并成为当地本土的一部分了”^②。史书美举例说，印尼出生的土生华人 (peranakans) 与马来西亚的混血峇峇 (babas) 都已发展出独自的文化混杂性，拒绝“再中国化”，她由此对“离散中国人”这种概括式的分类方式加以批判道：“在离散中国人研究中过渡强调原乡的概念，既不能陈述华语语系族群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不能表达任何一个国家那日渐增加的民族与文化异质化。就全球化的历史长程来看，异质化与混杂化一直以来都是常规，而非例外。”^③ 史书美对离散中国人研究的批评，也就道出了此书的写作进路：

本书不仅仅提倡在华语语系族群的散布研究、族裔研究、区域研究与中国研

①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②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9页。

③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2-53页。

究之间搭起桥梁，也希望能在法语语系（Francophone）、葡语语系（Lusophone）、西语语系（Hispanophone）以及英语语系（Anglophone）世界中寻求共鸣。因此，此处所指的华语语系概念，包含了在中国之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Sinitic languages）的各个区域。华语语系族群就像其他非大都会中心（nonmetropolitan）地区必须使用大都会中心（metropolitan）语言一样，也有着一部殖民史^①。

可见，“华语语系与中国的关系充满紧张”，其情况与法语语系、西语语系、英语语系之于法国、西班牙、英国之间的关系一样复杂暧昧。一方面，史书美借用德勒兹与瓜塔里“少数文学”的说法，将华语语系实践为一种“少数表述”；另一方面，华语语系是特定地方的地方语言的荟萃，透过表述而获得自主权。她又指出，如果永远满怀乡愁地回望中国，华语语系也可以表述出中国中心主义，视中国为文化祖国或价值根源；但更多时候，它是一个反中国中心的场域，其目的是“检视华语语系族群与中国的关系是如何愈来愈多样化、愈来愈问题重重；以及此关系是如何成为地方、全球、国家、跨国、移居地及日常生活实践等多角度、多元价值的脉络中，定义华语语系的其中一项因素。当在地的关注以在地的语言发声，进而逐渐取代移民们（和其后代子孙）移居前关注，华语语系便会成为逐渐消失的概念，最终华语语系会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因此，华语语系作为一种分析与认知，便与特定的时空有关”^②。这种特定的“时空”，不仅指向境外，也可以指向境内。在史书美看来，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也是华语语系文学之一，也许他们用汉语创作，但感觉结构与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相对。

史书美不遗余力地推行“华语语系”，其更高目的是要挑战一切类似“中国人”、“中国性”等“本真性体制”（regimes of authenticity）^③的东西，其华语语系范畴着重强调：其一，离散终有尽，一旦移民定居并变得本地化，第二或第三代都会选择结束

①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3-54页。

②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8页。加点处为笔者所加，后文会对史书美的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与批判。

③ “本真性体制本也是虚构的，却运用了各种象征性或暴力形式来对付体制内外的分子。在任何一种本真性体制中，包容和排斥往往可以勾勒出暴力的边界，然而包容和排斥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a matter of degree）。包容性政治范围内的各种断层线，对范围内的人们来说也可以是褫夺权力以及压迫。包括（inclusion）可以和排除（exclusion）一样有问题。‘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性’等类别一方面来自历史的沉淀，透过失忆、暴力以及帝国意念而建构；另一方面也源自主观地渴求归属感与共同体。”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66页。

离散的状态，成为当地人；其二，语言群体不断变化和开放，当移民后裔不再说祖先的语言（各种汉语）时，他们便不再是华语语系群体的一员，华语语系社群只是一个过渡，它将与在地社群逐步融合。“弱裔化（minoritization）是一个过程，身份认同是一个时间的范畴（temporal category），而不单单是一个存在的、文化的、政治的或地理的范畴。”在史书美那里，身份转变需要的只是时间。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将问题与解决统归于时间，一切等时间来裁决？这岂不是另一种时间神话或时间的暴力？甚至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偷懒的、不敏感的时间症患者？

在书的“结论”部分，史书美总结道：华语语系将拆解以往“离散中国人”研究中的一些本质概念，重新表述那些多元化、本地化、混杂化、文化混融的具有复合理解的概念；重新思考“源”（roots）与“流”（routes）的关系，“根源”可以看作在地的而非祖传的，“流”可以视作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家（homeness）的概念；当“流”可以成为“源”的时候，华语语系社群面对原出国和定居国时都可以持一个批判的立场，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①。至此，史书美借着华语语系试图表达一种“反离散”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尽管此时她在书中并没有使用“反离散”一词。

“反离散”被正式提出并出现在标题中，是史书美 2007 年的重要论文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②（《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这篇论文是对同年出版的英文版《视觉与认同》一书“导论”和“结论”的抽绎，将原著呼之欲出的“反离散”固定在一眼可见的题目中。文章开宗明义道：本文“借助对‘离散中国人’（the Chinese diaspora）这一概念的分析 and 批评，提出华语语系研究的粗略轮廓。在我看来，‘离散中国人’这种提法是不恰当

①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274-275 页。

② 该文是史书美应石静远和王德威之邀，为参加 2007 年 12 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文学与离散写作”（*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and Diasporic Writings*）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写，后收入王德威和石静远为此次哈佛大学国际会议选编的论文集《全球中文文学论文集》（*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Jing Tsu and David Der-wei Wang,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0）。2013 年，史书美与蔡建鑫、贝纳德合编的《华语语系研究批判读本》（*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Ed. by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再次收入该文。其中文译文见《华文文学》2011 年第 6 期。事实上，这个题目还可以追溯得稍早一些：在 2007 年 3 月，史书美受台湾大学外文系邀请，所作系列演讲题目即是这篇论文标题，但是外文系为演讲所作的宣传海报却将“Sinophone”译作“华语性”，将题目“*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译为“反离散：华语性作为在地的文化生产”。可见，当时台湾学界对“华语语系”概念并不熟悉。尽管前面已提及早在 2004 年，史书美的那篇《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已由纪大伟翻译并发表在台湾《清华学报》上，当时“sinophone”的对应中文即是“华语语系”。

的”，“离散有其终时”^①。简而言之，其“反离散”论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其华语语系文学不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学，这一点恰与王德威不同；二是离散终要结束，这一点上文已稍作批判，到此更是自相矛盾——既然离散终有尽的时候，何必还大费周章地“反”呢？这里只谈王德威与之形成的对照。

王德威与史书美几乎同时关注到华语语系这一论域。上文曾提及王德威 2006 年的论文《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这是中国大陆媒介首次出现“华语语系”。王德威在文中提到自己 2006 年春在哈佛大学组织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工作坊，探讨了四个议题：“（一）旅行的‘中国性’”；“（二）离散与迁移”；“（三）翻译与文化生产”；“（四）世界想象”^②。而早此一年，他策划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苏州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于 2005 年 6 月在苏州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正是“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会议的部分论文于 2007 年结集出版，书名也是《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在王德威写的“序”及附录“会议综述”中，在他 2006 年发表在中国港、台及大陆媒介上的相关论文中^③，四项议题乃是核心，但在具体表述上有细微出入。

四项议题前后最大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将（一）、（二）议题中的“中文文学”换成了“华语语系文学”，将（三）议题中的“中国”换成“华人社群”。这种替换，与其简单推测说在王德威那里二者本来是等同的，还不如说体现了他对“华语语系”这个“新兴观念”的敏感与关注。二是对于第（四）议题“世界想象”中的“中文文学”没有被置换成“华语语系文学”，我们同样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是他的疏忽和遗漏。恰恰在这里，显示了王德威的顾虑和犹疑：“Sinophone Literature 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但这样的译法对识者也就无足可观。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惯用华文文学指称广义的中文书写作品。”^④王德威保留“中文文学”，可以说为其理解的“华语语系文学”预留了空间，因而他在保留之余，却增加了两个词——“本土”与“华人”。换言之，他的“华语语系文学”既包括了大陆“本土”文学，又兼顾域外“华人”历史。这正是王德威与史书美的最大不同，其观点显然要辩证得多。

①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②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这篇文章同年在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7月号 and 台湾《联合报》2006年7月8日等媒体刊载，题名《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也载《上海文学》2006年第9期，题目改为《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

③ 王德威、季进主编：《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会议的部分论文在2006年初组成专辑发表，王德威等围绕四项议题写了一个专辑引言。详见王德威、季进：《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专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④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后来,当史书美将清朝视作一个内陆殖民帝国时,王德威对中国近代历史是否有西方意义上的殖民主义经验表示怀疑。王德威希望不必像史书美那样斤斤计较于华语和中文的对立,华语语系的观念“不必局限于海外华人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发音/发言位置上;我们应该把‘华语语系’的问题意识置入广大的中文/汉语语境里面”。王德威的意思很清楚,要把华语语系观念适用于中国大陆,就“要实实在在去思考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方言、每一种族群、每一种不同文化的创作者和阅读者,他们激发出什么样的汉语。我们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大陆境内的汉语/中文就是华语语系的一部分”^①。王德威强调要在更为复杂也更为宏远的历史视域中来看待今天中文或华语的竞争与协商局面。为此,他提出华语语系的“后遗民”现象:如果说遗民的本义指向的是时过境迁、伤逝悼亡,那么后遗民却奇怪地把遗民观念召唤回来。“我所谓的‘后’,不仅可以暗示一个时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而不了。而‘遗’,可以指的是遗‘失’,是‘残’遗,也可以指的是遗‘留’。如果遗民已经指向一种时空错置的征兆,‘后’遗民是此一错置的解散,或甚至再错置。”^②在王德威看来,“后遗民”不是“遗民”的延伸,更重要的是,海外华语语系的子民在世代传衍之后,何以在离散或落地生根之后,明知回不去了,却仍然汲汲于对中国的想象和实践?

王德威认为,史书美所征用的后殖民理论论述并不能满意地解决20世纪华语语系文学的生发,“只有当我们正视后遗民思维的不绝如缕,我们才能理解这是华语语系文学与其他语系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后遗民论述让我们在海外面对中国性或是华语所谓的正统性的问题,产生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批判和自我批判”^③。王德威的“后遗民”论述,既是对史书美“反离散”论的反驳,同时也试图为华语语系的中国大陆身份寻求合法性。

参差的对照 2: 离散为历史与离散为价值

史书美的“反离散”论在不同地域引起了争议,随后她特意做了“离散为历史”(diaspora as history)与“离散为价值”(diaspora as value)的区分,强调自己“反离

^①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1-152页。

^②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5页。他曾提出海外华文文学的“三民主义”论,即移民、夷民和遗民。大致地说,第一代华人在海外的身份是移民,移民后代融入在地文化成为外国人就是夷民,而拒绝融入移居地文化、坚持“花果飘零,灵根自植”者则为遗民。

^③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6页。

散”反的是“离散为价值”，而非反离散之作为历史^①。离散之为历史，指海外华人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象；离散之为价值，指华人在各移居地抱持一种侨居者的心态，永远向往中国为原乡，不认同在地文化。史书美认为后者要加以批评，离散者不参与在地和当下，是对在地的伤害，这样的离散需要有终结的时候。进一步说，全球的华人社群在所在国家往往被排斥，被视作外来人，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机制实行的是“离散为价值”的原因。比如在马来西亚，这个概念就可以是针对马来西亚政府的批判。离散为价值，对离散族群来说，表现为缺乏对在地的承担；对既得利益者和维权者来说，是一个排外的价值观，因而与个体在特定社会的角色与认同有关。

王德威对此表示异议，认为离散虽然有历史和价值的分野，但二者之间很难做出清楚的分界与切割，更不同意华人历史或记忆只和华人的过去经验相关。他认为离散可以当作一种价值，而且是一种积极的价值，“离散甚至可以是被发明出来，作为一种政治批判性的选项”^②。这个“发明”可能出于外力的强迫，但也可能来自个体的选择和想象。王德威认为对“离散为价值”既要保持批判性的警醒，更应该发掘离散的辩证面，看到离散的政治潜力和能动性。王德威也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如果告诉他们离散已到终结之时，他们应该无条件去爱大马祖国，对他们未必是公平的。因为在一个族裔政治和身份认同仍然有着非常不平等待遇的国度，“华人如果不去维持他们离散的危机意识的话——不论是自行选择的，或是被打压而消失无形的——反而不足以巩固他们的公民地位和族裔合法性”^③。王德威认为史书美的反离散初衷是倡导多元族群的融合，可以言之成理，但以施行文化和族群差异待遇的马来西亚为例，可能反而会成为执政者遮蔽独裁、压抑多元的借口。华族或中国文化在海外经过数代传播仍绵延不止，如果旁观者用“高瞻远瞩”的姿态来告诉他们离散有其终时，未免隔靴搔痒，不顾历史现实和华人的真情实意。

在史书美那里，华语语系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社群和文化，以及大陆内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少数民族社群和文化。这些语言社群的形成大多涉及三个或交错、或重叠的历史过程：大陆殖民（continental colonialism）、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和移民（migration）^④。大陆殖民意指不同于现代欧洲帝国在海外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中国清朝的殖民地居于内陆，即“大陆殖民”。大陆殖民的概念对现代帝国主义与海洋扩张之间的必然连接构成挑战，华语语系也必然将少数民族的

① 史书美：《华语语系的概念》，吴建亨译，《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月刊》2011年第14期。

② 王德威、史书美：《“华语语系与台湾”主题论坛》，（台湾）《中国现代文学》2017年第32期。

③ 王德威、史书美：《“华语语系与台湾”主题论坛》，（台湾）《中国现代文学》2017年第32期。

④ 史书美：《何谓华语语系研究？》，（台湾）《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2期。

语言、历史和文化纳入考察的范围。定居殖民主义是指，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群在当地由多数人口（如台湾和新加坡）或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口（如马来西亚）聚集成华语语系社群。基于此，史书美认为“中国离散”的提法大有问题，它粉饰了定居殖民主义的暴力，对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离散”把华人与中国故乡绑在一起，预设了华人对故乡的思念，而不顾他们在外居住了几个世纪，在政治上不再效忠中国。移民或迁徙是指，华语语系少数民族社群大多数集中在西半球国家，占当地人口的少数。汉族几世纪以来的迁徙在迁徙地形成一个被族裔化与种族化的少数社群，其多样性的华语与文化的维持与衍生为中国境外华语语系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

史书美之所以如此强调华语语系研究与族裔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凸显华语语系文化的在地性和反离散性，认为华语语系文化是所在民族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和多语主义的一部分。她举例说，美国的华语语系文化是美国文化，在美国使用的各种华语也应该被视为美国的少数语言。美国华语语系文化中对中国的思乡之情出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所以是一种美国的思乡之情。从构成的层面来看，华语语系文化是跨国的；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华语语系文化却是在地的。

王德威对史书美如此“清洁的区分”再次表示质疑且语带反讽：没有人愿意离散，谁都希望在自己选择的土地上安居，但“反离散”不也像史书美所批评的离散那样可以成为一种“价值”吗？排除离散的危机语境，未必能够带来多元共存的向度。多少华人希望落地生根，希望“反”离散，却“被”离散，被迫走上街头。时间未必能抹除一切记忆，即便认可美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但也没有达到多元文化共荣共存。因此，离散无论作为经验还是作为价值，都有存在的必要。

可以说，王德威、史书美二人的离散观其实相差较远，甚至相对。离散确实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和命题，必须放置在历史与现实中，与华人的经验并存，接受时间与记忆的检验，也接受现实的考验。

参差的对照 3：非中国中心论与“势”的诗学

无论王德威还是史书美，他们对于华语语系的表述和思考也都随着时间和实践的变化而有所修订和增益。史书美早先强调“每一在地实践和批评有它的伦理上的不可避免性，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对诸中心论的彻底的分析和反驳，对反中心的华文化主体的建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因此是反离散的在地实践，探索在地的政治主体的华语文化生产，而不是流放或离散主体的自恋式的怀乡母国症”^①。史书美有

^① 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刍议》，（台湾）《中外文学》2007年第2期。

关华语语系的反离散论是否就是常言的反中国中心论？在一次访谈中，面对提问者“怎样可以在一个朝向去中国中心的华语语系研究里”解决其向一个学科发展时不得有的局限这一问题时，史书美回答：

我先说明，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它也是对在地的不同的中心论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我们在谈美国的华语语系文化，它是对美国白人中心及英语至上论的挑战；我们在谈马来西亚的华语语系文化，它是对马来中心与只有马来语文学可以被看作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个挑战。在新加坡的情况的话，华语语系所挑战的东西又不尽相同，对不对？因为新加坡在后殖民的情况下，在英国殖民过后的整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国际都市的一个走向下，华语语系有它自己不同的批判对象。以为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是一个错误的。事实上，华语语系研究可以在美国研究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以在马来西亚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以在非洲研究，或者是法国研究都有。……因为华语语系群体全世界到处都有。事实上他们的在地经验和在地批判是对那个地方的民族、种族、文化这些多数的、国家意识等等建构的批判。而当然他们也有对中国的看法或反思，对世界有所思考，在地或跨国，也是他们的选择。所以，它真的不只是对中国中心的批判^①。

史书美的这番回答需加细察，可以视之为她对自己以前尖锐、过激表述的缓和或修正，甚至不乏在华语语系论述此消彼长的涡流中一个真诚的回应。但我以为这番话中还有三个层面需要斟酌：

一是她强调华语语系研究应该在美国研究、马来西亚研究、法国研究、非洲研究中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换言之，只要有华语语系群体所在的国家，华语语系研究就是本国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语语系文学就是本国文学之一种呈现……尽管她一再申明自己“不只是对中国中心的批判”，其观念背后依然是“在地化”的决定论，这是史书美有关华语语系表述前后一贯的坚持。问题是，用“在地化”来压抑离散甚至“反离散”，既是对华人离散历史的忽视或故意不见，又与自身所主张的华语语系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相互抵牾。

二是史书美在试图澄清华语语系研究中的去中国中心的误解时称，华语语系也是对一切在地的中心论的挑战，如美国的华语语系文化是对美国白人中心和英语至上论

^① 许维贤、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史书美访谈录》，杨明慧录音整理，（台湾）《中外文学》2015年第1期。

的挑战等，这样的辩证反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因为在她接下来的论述里，她用各华语语系的在地国家研究（美国研究、法国研究、马来西亚研究等）覆盖、压缩、收编了华语语系群体，是一种反中心的中心主义论——美国中心论、权力中心论、强势文化中心论。这一点即使不是她的本意，也恰恰暴露出东西方“汉学主义”的政治无意识与文化无意识^①。如果考虑到史书美个人的经历——出身于韩国华侨背景，在台湾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在美国攻读硕士、博士后就业定居——其身世家国，作为一个离散者的反离散，多此一向度的脉络和参照，她的“复杂性”恐怕要更为复杂。

三是从史书美的阐释来看，华语语系可以批判中国，也可以批判美国和其他地方，无论“在地或跨国，也是他们的选择”。循此逻辑，管他什么中国中心也好，去/反中国中心也罢，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阐释位置与立场。这样，众声喧哗中的喧“华”才真正回到了华语语系这一概念本身开放的空间，减少喧“华”中的机械政治噪音，回归华语的学术场域与美学逻辑。

王德威曾自觉地意识到这场有关华语语系与中国文学论述的搅扰，其理论资源没有脱离“空间/位置的政治”（spatial and positional politics），一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多立刻想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文学；一提到华语语系文学，可能立刻想到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在这个二分基础上，我们有了内与外（interiority vs. exteriority）；包括与排除（inclusion vs. exclusion）；定居与离散（settlement vs. diaspora）等等划分畛域、区别立场的论述。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如敌或友（hostility vs. hospitality）；整合与抗争（governance vs. resistance），尤其耐人寻味。”^② 客观地说，王德威的这种意识还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他坚持并强调一个文学史观察者必须将研究对象历史化的意识。正如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③，恐怕就决不像西方学者所谓“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④那样简化问题，我们更应该在历史中来理解民族国家。

相对于华语语系与中国论述之间“根”的政治的纠缠，王德威提出了“势”的诗学。所谓“根”的政治，是一个隐喻的说法，指以往离散文学研究把祖国的历史文明比作根深柢固的大树，华裔子民在海外像“失根的兰花”，时有寻根的冲动和叶落归

① 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张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一、七章。

②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台湾）《中国现代文学》2013年第24期。该文又见《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③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④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根的愿望。而华语语系文学的不同，就在于反对寻根、归根这样的单向运动轨道。但即便如此，反离散论者的修辞策略却似乎仍围绕着“根”的隐喻，仿佛必须连根拔起，才好另谋发展。相对于叶落归根的呼吁，只有在移居地落地生根，才能成就华语语系的主体性——不论是这一主体性的塑造还是舍弃。王德威认为，以“根”为出发点的华语语系研究，并没摆脱空间政治学的窠臼，于是提出一种与“根”的政治不同的、具有辩证潜能的“势”的诗学。

我以为“势”的论述可以作为探讨的起点——这是一种移花接木的阅读。如果“根”指涉一个位置的极限，一种边界的生成，“势”则指涉空间以外，间距的消长与推移。前者总是提醒我们一个立场或方位（position），后者则提醒我们一种倾向或气性（disposition/propensity），一种动能（momentum）。这一倾向和动能又是与立场的设定或方位的布置息息相关，因此不乏空间政治的意图。更重要的，“势”总已暗示一种情怀与姿态，或进或退，或张或弛，无不通向实效发生之前或之间的力道，乃至不断涌现的变化^①。

“势”的论述，是中国古典文艺的本土资源，哲学、书法、绘画、舞蹈皆有“势”论，单就文学来讲，有刘勰《文心雕龙》谈“定势”、王昌龄的“十七势”、皎然《诗式》中的“明势”等^②。王德威可谓借力使力，在政治与审美之间寻求协商，重写文学史中隐与显、主与客、内与外的关系。如此一来，“华语语系文学不是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它的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或博弈。……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所站的位置的局限，但这无碍我们对华语文学边界何在的好奇与探索。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已经可以展开”^③。

王德威的借“势”论事、借“势”见史、借“势”认时、借“势”论识、借“势”辨式，在某种程度上赓续了中国传统诗话的感悟特征，销蚀了华语语系概念容易引起的政治敏感，回到了文学本身的“模糊”，这正是华语语系这一概念无论论者持何种立场，都申明其“开放”的特质。王德威后来的“华夷风”论述，可以说接续

^①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台湾）《中国现代文学》2013年第24期。

^② 关于中国传统“势”论，详见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作者在书的开篇指出：“‘势’这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意蕴相当丰富的词，在不同场合可以分别解释为形、姿态、权力、地位、时机、法度、情状、威力、规律和运动趋向等等。在保持自身基本含义的情况下，它能与其他字组合成许多复合词和成语、词组，比如形势、姿势、声势、气势、趋势、态势、势利、势力、势态、势焰、势头、均势，以及势不两立、势均力敌、势如破竹、因势利导、大势所趋、趋炎附势、审时度势、虚张声势、势不可挡之类。”见该书第1页。

^③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台湾）《中国现代文学》2013年第24期。

了其“势”的诗学，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风”的诗学：“‘风以动万物也。’华语语系的‘风’来回摆荡在中原与海外、原乡与异域之间，启动华夷风景。”^①“风”与“势”的联动，是王德威有关华语语系论述的最新动态，也是他最理想的境界。从根本上说，其“风”与“势”的诗学，勾连了文学是人学的要义，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人、人间、人生、人性，这是王德威与史书美及其他论者之间关于华语语系论述的最大不同。

余论：作为一个批判的界面

华语语系研究真可谓众声喧哗，在不同论者那里，它既可以是一个问题，又可以是一种方法；既可以是朝着生成一个新的学科方向的迈进，也可以是既有学科的分支；既可以是地缘政治学，又可以是一种区域文学；既可以是诗学理论，也可以是一番文学实践；既可以是一个平台/跳板，也可以是一个起点/终点；既可以是一种想象，又可以是一种现实。华语语系就像一只博尔赫斯所言的“睥睨怪兽”，贪得无厌而又吞噬自身。

在接受单德兴的一次访谈时，史书美毫不掩饰自己从事研究的位置和目的：“我会清楚地讲，我的作品很多是来自美国的学术环境，以及在那里所进行的学术对话，绝不是甚么普遍的东西。同时，我也来自被边缘化的场域与声音，却不能宣称自己为哪些地方代言。我目前有关华语语系的工作，以及我正在进行的新计划，就是要如何建构另类的理论架构，而不只是在强势之外加上弱势。这并不是加法政治学（politics of addition），而是关于改变我们了解某些议题的方式，或者我们如何将典律加以概念化。那是从根开始来改变基本的观念。华语语系研究并不是在中国文学上再加上华语语系文学，或者在法国文学或美国文学上再加上华语语系文学，而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思考美国文学是什么、法国文学是什么、中国文学是什么、马来西亚文学是什么……它是关于单语国家文学的建构的反思。许多诸如此类的事，而不是以加法的形式存在。因此现在我也在进行一个世界文学的计划。同样地，那并不是把更多非西方的书或弱势族裔的书加入世界文学的典律，不是的，而是重新思考我们最初应该如何定义世界文学。”^②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与王德威一样，史书美也在不断修订自己对于华语语系的研究；同时，华语语系文学最终回到“文学”——不管是中国/华语文学，

① 王德威：《华夷之变：华语语系研究的新视界》，（台湾）《中国现代文学》2018年第34期。

② 单德兴、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及其他：史书美访谈录》，（台湾）《中山人文学报》2016年第40期。

还是世界文学——史书美与王德威的论述在这里有了交会与交汇（但永不会合流），这或许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

正如王德威不断重述，“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这无碍我们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好奇，以及由此而生的尊重。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已经可以开始”^①。尤其是在中国的“新时代”及变化了的也不断变化着的新的语境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崛起”、“中国梦”等现实与希冀中，重提与重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显然，这样一个时刻决不是重复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的单向运动和一厢情愿。我们要问的不只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文学”，而是有关“中国”、“世界”、“华语”、“文学”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身发生着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因而充满动态的调整和可能。在如何看待“华语语系”这一论域上，我们除了分殊那些隐与显、内与外等二元对立式的关系外，更要意识到三元乃至多元的存在。哪怕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其任何一边都可能处在一个相互缠绕的关系网络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也可能联结起无限的世界。这或许就是王汎森所谓“执拗的低音”^②，或坂井洋史所言“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暗部”^③。作为一个辩证的起点，“华语语系文学”并非要终结什么，究竟怎样辩，怎样证，辩得如何，证得如何，都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说华语语系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我们的研究还有效和有价值，那就意味着华语语系到目前为止并非一个固定的范畴，它还处于流动、变化和不断生成之中，为我们检视“文学”提供了一个批判的界面。史书美所谓离散终有尽不无一厢情愿的个人想象，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的关系，其间的错杂搅扰或如雪泥鸿爪，必定成为定义华语语系有关地方与全球、国家与跨国、故乡与异乡、定居与流徙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多元价值脉络中的重要因素。更要警惕和反思的是，当各种理论轮番演绎“华语语系”时，我们发现真正的主角——“文学”被旁落了。“华语语系文学”这只“睥睨怪兽”，或将对所有接近它的人，斜目而视？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②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页。

③ [日]坂井洋史：《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